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Nanjing Datushashi Yanjiu

上

张生 等 著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Nanjing Datushashi Yanjiu

张 生 董为民 郭昭昭
严海建 屈胜飞 王金静

著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 张生等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506-1179-5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南京大屠杀—研究
IV. ①K265. 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8018号

- 书 名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著 者 张 生 等
责 任 编 辑 陈晓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210038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51.75
字 数 954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179-5
定 价 18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68037411)

本书由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资助出版

序

张生同志和他弟子们的著作即将问世,有幸成为该书最早的读者,我首先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日本侵华战争中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至今已经过去了 75 周年。而对这一残暴事件的国际性的审判,也已经过去了 60 多年。但是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似乎仍不减当年,而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与争论,也构成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视野的扩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也不不断深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这是在新的时期这一研究成果出版的重要意义。

在事件发生 75 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三个层面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研究,即: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法律案的南京大屠杀,和中国国民认知中的南京大屠杀。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有各种主体、各种角度、各种立场、各种用意、各种载体的记录,它们之间的相互映照,显示出各自的说服力和缺憾。在文献渐近穷尽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出中心事实是:1937 年 12 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世界近代史上亦为罕见的惨剧。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日军以各种理由加以戕害,南京十数年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影响及于今日。

在基本事实的层面,我们看到: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及其激发的全民战争狂热;日本战争战略的变迁;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等扩大战争、膺惩中国的决心;日本外交人员与军方的一致与分歧;日本政府和军部内部的不同考量;各种层级的“屠杀令”;日军中弥漫的对中国人的蔑视和报复心理;乃至日军官兵在屠杀中的不同态度等等,一一呈现。国民政府持久抗战战略及其在局部的反复、错误;南京卫戍军的顽强与雪崩式溃退;南京居民的撤退、留守,乃至“改朝换代”心理;中国人苦难中的沉默、反抗,与逆来顺受、苟且,甚至伤害同胞并存;市民生命财产遭受的巨大伤害与顽强的生命力;社区的破坏与重建;“不信青史尽成灰”的操守与政治性暧昧;汉奸、伪政权浮出台面,及其复杂角色等等,次第展开。西方人士留守南京、看护南京的动机;西方国家政府

基于国家利益在大屠杀期间的反应；民间意见与官方态度的分歧；西方人士与日方交涉的过程和策略；“安全区”的运行及其功能；西方人士与中国民众的互动；西方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消息的传播；西方人士在南京的存在对日军占领模式、殖民模式的影响等等，均明晰可见。所有这些，构成了战争前后南京的全息图景。

严酷的史实甚至超过了任何想象：在进出南京的交通要道挹江门，中国人的尸体堆到几英尺高，日军的卡车来回碾压，噗噗地冒出血水；仅佐佐木部队就屠杀战俘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个日军中队长也能带领士兵屠杀1300多人；密布南京的水塘里扔满了尸体，日军官兵和中国居民都得饮用被染红的脏水；被害中国官兵身上的现金被搜集、流通于南京，称为“臭票”……上至七十多岁、下至六七岁的妇女、女孩被普遍侮辱，甚至国际安全区官员的女眷、从事医疗救助的护士也不例外，仅1937年12月16日一个夜晚，金陵大学及附近即有1000余妇女被强奸；日军性暴力多为集体行为，在光天化日或被害者亲人面前进行；日军性暴力伴随杀害，并造成性病爆发，被害妇女怀孕、意外生育，以及长期遭受“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等病痛折磨；“慰安妇”广告堂而皇之张贴于南京闹市区，有妇女被数百次强奸……有组织的抢劫和焚烧，造成南京地区巨量财产损失，当时统计调查即达1亿美元之巨，约相当于当时中国约100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20；日军官兵收获巨大，有人每月竟能汇回国内上千日元；伪自治委员会首脑、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等，亦在被洗劫之列，日军抢劫之后，怂恿、默许中国贫苦妇孺进行偷盗，掩盖自身罪行；南京地区的铜铁等金属当时即作为战争物资被运回日本，文物书籍等自难幸免……日军操纵下的公开贩毒、销售，使南京毒品泛滥，烟馆等遍地开花，虽在西方人士目击下亦不避讳，每月盈利达数百万元。

大屠杀非惟中西人士熟知，即使日军官兵，亦在其日记、书信中详加描写，甚至在被杀中国人头颅与被害妇女的裸身前拍摄照片炫耀其“勇武”。日方高层当然也心知肚明，所以，日本艺妓、女演员等在大屠杀期间即被组织到南京，拍摄她们安抚中国孩子的和美照片；珍馐美味运到南京，招待西方在宁人士；更有日军士兵驮背中国大娘、帮中国居民担水等“杰作”问世，企图扭转在国际社会传播中的日军残暴形象。

当然，史实中亦有悖论式事实：日军为引导南京居民离开西方人士的庇护，在安全区外免费发粮；个别日军官兵与西方人士相处良好，参加礼拜，赠送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救助中国居民的个案；个别宪兵，因看守难民营得到西方人士的好评；南京日军警备部队的军纪也有程度上的差别。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本体是宏大、多面的，而作为法律案，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头绪中，厘清因果关系，找出责任人，裁定其应负责任。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依据国际法和当时中国的国内法，以对谷寿夫审判和判决为中心，确定谷寿夫及

会攻南京之日军将领对屠杀负责。对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的审判,则确定战争中屠杀战俘及非战斗人员的犯罪性质。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依据国际法和美国法庭的一般规则,围绕松井石根明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的渎职行为,明确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体系和事件性质。两场审判的效力,均为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中加以承认,也是今天整个国际社会看待南京大屠杀的基本立场所在。

审判唤起了集体记忆,亦引发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参与。判决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南京居民受到的伤害,伸张了正义。但两场审判均在不同程度上留有缺憾和后遗症。特别是东京审判,由于政治考量、资料搜集不够充分等原因,未能全面、彻底厘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和战犯责任,其中辩护方的证据和质证思路,竟成为后来日本右翼企图翻案的思想源泉。

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已经 75 周年了,中国国民对其认识不断变化、演进。1945 年,蒋介石核定日本战犯时,将“政治负责部分”如近卫文麿等 41 人“一律删除”;“军事负责者”等“亦一律免除”,其中包括松井石根;仅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谷寿夫等“特务工作之恶贯满盈者为主”(蒋介石 1945 年 10 月 14 日日记)。其不问究竟、条理不明的“以德报怨”政策,主导了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清算思路。在南京审判、东京审判中,中方准备工作之粗疏、参与过程之马虎,应与此有关。去台之后,因政治变迁和盟友关系,国民党官方对南京大屠杀“选择性遗忘”。中国大陆方面,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尤其是美方人士作用的认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此后长时间中,一厢情愿地以“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发动战争的是一小撮日本军阀和军国主义分子”为言说主轴,忽略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社会的危险倾向,对日本进步力量的反省也置若罔闻,只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中简略提及,以至普通国民几乎遗忘。1980 年代后,随着“教科书事件”的发生,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设、布展为契机,南京大屠杀被“重新发现”。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语境下,认清历史真相以促进中日真正友好成为研究与认知的支点,使南京大屠杀迅速成为中日关系中最显性的因素之一。

1990 年代以后,伴随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勃兴,中国国民普遍地知晓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不断挑衅、刺激,各种文献次第发现,受害者和目击者调查的持续开展,案例的大量积累,广泛的新闻报道,频繁的纪念活动,全城鸣笛哀悼,等等,相关信息的扩散和再构造,使国民中的受害者意识和“命运共同体”观念得到强化。在学术研究获得长足进展的同时,国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成为与政治、社会紧密互动的思潮性存在,并与慰安妇、细菌战、化学战、强制劳工、无差别轰炸等其他战争遗

留问题交互鼓应。特定情况下,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进入 21 世纪,中国学界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已经渐渐成熟为一门有着自己概念、范畴、对象、文献体系、学科标准的新的专门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中国学界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超越了谴责侵略、追究暴行的一般性的道德评判,而使国民之认知有了新的观照:战争对人性的影响,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大屠杀中相关群体的内部复杂性,战争国际法,战争暴行的比较研究,南京大屠杀在人类共同历史中的地位,与战争加害国民众历史认识的互动,促进其对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思考,战争后遗症的治疗与弥平,战后和平的构造,等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学术研究 with 国民认知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现实的可能。

我与张生先生相识已久,对他在历史学学术领域的努力耕耘,特别是他将具有历史哲学深度的思辩方法融入其研究课题的尝试有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本作为专注于史实的新的成果,体现了他多年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深刻的思考。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关心该问题的学者及广大的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慎终追远,实事求是,是本书的宗旨,也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共同目标。

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写了上面的话,以表达我的感触与心情。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 步 平

2012 年 1 月于北京

自序

研究南京大屠杀史,至少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不能也无法回避。其中,宏观、中观和微观,交错呈现,交叉影响: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时,日本军方人士表示,在第三方人士的目击下,完成对敌国首都的占领,在世界史上没有先例。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被占领的南京,确实滞留了二十多名外国人士,他们的国家在中日战争中尚处于中立状态。但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深深地介入其中。他们通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平台组织起来,在国民政府和南京特别市当局西迁的情况下,承担了部分的市政管理职能,从而与南京的日军、日本外交机构、日军扶持的傀儡政权发生交涉,对后者行为形成压力和监督。他们对南京沦陷前后日军行为的观察、记录、分析和传播,使南京大屠杀为时人所知,并成为国际事件。

第二,早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均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设定了持久战战略,并作了相应的部署,南京的沦陷,毋宁说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日军中以松井石根为代表的一些人,却以为占领被视为“抗日堡垒”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可以歼灭中国有生力量,摧毁中国的抗日意志,使中国“威服”,从而速战速决。双方认知中,对南京的定位,存在重大差异。

第三,占领南京后,日方内部存在一定的分歧。日军高层的一些人,抱持“膺惩中国”的想法,支持、放任,或者默许日军官兵的暴行,“屠杀令”的客观存在,显示了他们的犯罪故意;而以日方外交人员为主体的一些人,对战争法规、世界形势较为清晰,出于维护日本长远利益的目的,认为暴行有损日本国家和日军的形象,甚至有意让一些西方人士的抗议和对暴行的揭露流传到南京之外,认为这样可以施加压力,迫使日军有所收敛(英国外交人士语)。他们之间的分歧,使得与世隔绝的南京出现小小的缝隙。当然,这一分类不是绝对的,日本外交机构中恶棍与日军官兵沆瀣一气,日军中也可能存在个案性质的救助中国人的行为。

第四,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存在三个基本的人群:西方人士、日方人员、无助的

中国军民。由于西方人士提供人道救助和善意安排,中国人自然地倾向并依赖之;日军暴行使中国人畏惧并疏离,但欲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又必须将中国人置于其管理之下,形成两面三方的博弈局面。国际安全区本是日军默许下运行的临时机构,实力决定博弈的结果:安全区的难民在日军甄别、“安民”、关闭难民所、发粮等威逼利诱的措施下,渐渐解散回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组为“新秩序”下边缘性的慈善救济机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第五,南京大屠杀的高潮期持续了约6个星期,之前的轰炸和围攻,之后不时发生的日军暴行,都给南京居民极大的生存和精神压力,但生活在苦难中还必须继续。迫于战争威胁,南京居民的行为和生活状态呈现出和平时时期罕见的情况:大批年轻女孩仓促结婚;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徙、到周边地区“跑反”和京沪线难民的涌入,改变了南京的人口结构;政府机构、文教科研机构、厂矿企业的搬迁,使得精英、知识阶层几乎完全消失,留在南京的多为贫苦无告的下层民众,甚少有人给予他们战时生活必要的指导,陷入听天由命的随波逐流之中;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南京被占领后就业渠道十分狭窄,使得居民本就十分薄弱的承受战争压力的经济能力被摧毁,整个地区陷入极端贫困之中;利用一切可得的资源,顽强地生存下去,成为幸存者压倒性的任务,稀饭是许多人长期的主要食物,情急之下,在日军洗劫商店、住宅后,中国妇孺也有盗窃行为的发生。

第六,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可见的、显性的伤害,在事发当时,就被高度关注。暴行案例的积累和显性伤害的展示、宣传,是目击者、记录者的笔下焦点。其实,相对于幸存者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中受到的软性、隐形伤害,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等心理创伤普遍存在,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易被忽视的另一个层面,而且,这种伤害往往伴随受害者终身。与之相伴,社区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变更、个体生活史的颠覆,等等,均处于时人和多数今人的视野之外。

第七,战后,两场审判涉及到南京大屠杀,审判的结果,在《旧金山和约》等国际安排中,得到各国政府、包括日本政府的确认,成为讨论南京大屠杀性质和责任的法律基础。两场审判确立的是非意义巨大,是战后日本获得新生的历史起点,但无论是东京审判,还是南京审判,在程序和实体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可议之处,成为日本右翼的攻击要点。中国学界对两场审判的贯通性研究,还在初步状态。

本书绝不敢自称是对上述七个方面问题的精准回答,但表达了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勇气,以及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深化对上述问题理解的决心。

我深知,作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尽管我们无意接受学术之外规范的约束,但也不

可避免地受到教育经历、环境和认知水平的限制,所以,在酝酿、写作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我们注意倾听来自日本的声音,即使是右翼分子的狡辩和否认,我们也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挑战与鞭策,“激励”着自己求知求真。

友人们的意见促进了我们的思考。我要特别感谢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座谈中,我曾经提出,那些日本兵,在国内,很多人是孩子的好爸爸、女人的好丈夫、爸妈的好孩子,为什么到了南京,就成为无恶不作的野兽?大江健三郎表示赞成这种思考的路向,同时进一步提出:那些在南京犯下杀人、强奸、抢劫罪行的士兵,回到日本后又切换了身份,很多人重新成为孩子的好爸爸、女人的好丈夫、爸妈的好孩子,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心理转变?战争扭曲人性的机制和过程,至今仍值得深长思索。

朋友们的思考照亮了那些长期被我们忽视的盲区。山田正行教授(大阪教育大学)从日军在云南的性暴行模式出发,指出:日军多采用集体方式施暴,说明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是在敌对的环境中从事犯罪活动,是有组织的战争行为,目的在于从心理上给予中国人彻底打击——对女人身体的占领显示其征服者身份,中国男人则因为无力解救而负疚终生。他认为,日军军纪总体上是严格的,所以,暴行是在上级的命令或暧昧的默许下发生的。他说,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对南京暴行负有责任,战后,他立即取消了“宫”的称号,以此来切断与天皇的联系,防止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实际上,日本政府长期注意不把肮脏的战争罪行与天皇联系到一起,这影响了对战争的反省和认识。

平子友长教授(一桥大学)、渡边宪正教授(关东学院大学)和山科三郎教授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他们提出,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妨碍了他们对自己加害者身份的认知,对于受到其加害的中国人民,理应反省、道歉,给予赔偿。日本政府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和侵略战争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伤害,但同时又不断有人发出否定的声音,这不是真正的反省,因而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彻底谅解。他们进一步提出,不仅要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责任,也要追究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殖民、侵略“示范”和责任,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战争的起源和责任做深刻的清算,以使人类最终告别战争。这一天的来临虽然遥远,但他们表示,决不能因此放弃这一代人的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朋友们的意见并不是总与我们一致。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早年曾见过毛泽东主席,他对于日军暴行造成的南京人员伤亡有精深的研究,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亦有判明,但他现在改用“南京事件”而不是“南京大屠杀”来指称那一段历史。求同存异,在坦诚的学术研究基础上达成共识,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战争意味着对生命的摧残和伤害,侵略战争尤然;战争虽已远去,但厘清责任,才能真正总结教训。战后初期,德国普通民众曾经认为,战时德国的罪恶是希特勒和纳粹“一小撮”的事,与自己无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省的深化,他们意识到,每一个人和千千万万的其他普通百姓一起,也曾不同程度地涉入,负有自己应负的责任。在日本,有无数的证据表明,普通民众曾狂热地支持过对华战争。即以“百人斩”为例,绝非个案——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高价购买军刀,送给出征的子弟亲人,支持他们在中国战场上演类似的“勇武传”;天皇的近侍出征中国时,也得到了御赐的军刀。每一个日本国民都负有责任,是很多日本学者的结论,却被我们一些研究者长期忽视。促使日本当局“以史为鉴”,需要我们更为科学和全面的研究。

在南京大屠杀 75 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遇难者、幸存者,以及所有和我们一样期待正义与和平的人们。

张 生

2012 年 1 月于南京

本书分工：

张生，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全书统稿。

董为民，学术史、第三章。

郭昭昭，第二章。

严海建，第九章。

屈胜飞，第六章。

王金静，第五章。

全书照片由张生、董为民选辑。

目 录

序	(1)
自 序	(1)
导论:学术史	(1)
第一章 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看日军的战略时机选择	
——以日方思虑为中心的考察	(18)
第一节 选择战争	(18)
第二节 选择南京	(21)
第三节 选择屠杀	(24)
第二章 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市民生活秩序的变迁	(31)
第一节 常态生活秩序终结与防御期生活秩序来临	(32)
第二节 空位期的逼近、来临与延续	(64)
第三节 过渡期的胶着与“常态化”殖民秩序的系统创设	(119)
第四节 城内外信息传递	(146)
第五节 治安应对	(170)
第六节 房产问题	(194)
第七节 商品交易市场的关闭	(215)
第八节 水电设施的破坏与恢复	(237)
第九节 城内外交通运输的阻滞与开启	(250)
第十节 医疗救助	(263)
结语:战争、秩序变迁与市民生活	(284)
第三章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西方在宁人士	(295)
第一节 南京沦陷前的西方人士群体	(295)

第二节 西方人士与国际救援机构	(337)
第三节 面对大屠杀的西方人士	(398)
第四节 西方人士与日、中三方关系	(474)
第五节 西方驻宁外交人员	(506)
第六节 大屠杀之后的西方人士	(520)
第四章 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视角”	
——以德国外交档案为中心	(534)
第一节 “德国视角”的人员组成	(534)
第二节 “德国视角”的核心: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540)
第三节 “德国视角”与英美人士的互动	(549)
第四节 “德国视角”与德国利益	(557)
第五章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粮食问题	
——以“安全区”为中心	(566)
第一节 南京沦陷前的粮食供应状况与日军的粮食政策	(566)
第二节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方的粮食交涉	(582)
第三节 大屠杀时期南京居民的食物与生活状态	(609)
第六章 南京大屠杀对南京环境的影响	(626)
第一节 环境与南京城市发展	(626)
第二节 日军对南京社会生活环境的破坏	(636)
第三节 日军对南京自然环境的破坏	(658)
第四节 日军破坏南京环境个案研究	(667)
第七章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PTSD 初步研究	(677)
第一节 PTSD 概念的引入	(677)
第二节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PTSD 诸症候	(680)
第三节 魏特琳个案	(685)
第八章 从南京大屠杀看中国抗战前途	
——南京西方人士的观察和预判	(691)
第一节 仇恨心态和抵抗意志的激发	(692)
第二节 日本国家形象的恶化和对中国的同情	(695)
第三节 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	(700)
第九章 南京审判	(706)
第一节 南京军事法庭的成立	(706)

第二节 军事法庭的设置与构成	(713)
第三节 南京大屠杀案的立案与审结	(719)
第四节 审判的社会参与	(737)
第五节 对战后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反思	(746)
第十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审判中的辩护及其“遗产”	
——以控、辩双方质证为中心的考察	(750)
第一节 辩护方对起诉方出庭证人和宣誓证词的质证	(754)
第二节 辩护方的证人、宣誓证词及控方的质证	(761)
第三节 松井石根的宣誓证词和质证	(770)
第四节 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辩护方遗产的继承	(779)
参考文献	(790)
相关人名、舰名译名对照表	(805)
后 记	(808)

导论：学术史

2010年1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正式公布。南京大屠杀被双方学者确定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关键词”，是“日中间的论争点而被媒体关注”^①。但参与研究的日方学者的感受却是：与共同历史研究中其他方面展开的“热烈的辩论”相比，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争论并不激烈”^②。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日军侵华暴行的代表性事件，日本政治人物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被视为日本对过去侵略历史反省深度的主要指标。近30年来，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中日官方和民间舆论争辩的话题，民众情绪的催化剂，也是两国学术界相互辩驳的学术焦点。或许正是因为中日间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敏感性^③，甚至被大众媒体看成决定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成败的标志点，才使得双方学者较为充分地使用了“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研究原则，对有较大争议的话题并未加以深入论述^④，从而造成南京大屠杀问题并不如“册封体制”、“华夷秩序”等问题争论激烈的“反常”现象。

但没有激烈争论，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或者已经解决。真正拨去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这一“哽在日中友好交流喉咙上的一根刺”^⑤，是中日学者需要真正面对的问题。深入的实证研究，国际化的时代视野，在事实的基础上就南京大屠杀逐渐达成共识，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

回顾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对这一暴行研究的历史，可知从暴行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因为战时的环境、日军刻意的掩盖和毁灭证据、战后东亚地区的冷战等原因，而

①② [日]庄司润一郎：《“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第11页。中国学者也认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自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一直是学界和媒体报道、讨论的焦点”。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第5页。

③⑤ 有日本学者认为“在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教育与记忆中，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残忍、残暴的标志性事件。”[日]笠原十九司：《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与南京大屠杀论争在日本的终结》，《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第20页。

④ 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第8页。